

一、留在南京的家人

我生在三十年代初的龍盤虎踞帝王之都南京。

在我三歲多一點，強鄰入侵，而國內的左右陣營，雖藉抗敵而暫獲妥協，其實是內鬥不已，各有打算。到了四十年代中期，敵患雖除，但內戰的烽火已到處燃燒。最後，國內情勢左轉，國外情勢不變，在這雙重壓力之下，國府退到台灣一隅，痛心檢討，從頭開始。那時，我只有十五歲，在不知不覺中，加入了避秦奔台的一百多萬軍民的偉大行列。

留在南京無法逃亡的家人，有我父親和三個弟弟，他們只有聽天由命。

母親在我十二歲時，即因病過世。那時，她只有三十六歲。父親長我三十歲，寫得一手好字，尤其是仿宋字，專供木刻印刷用，當時已漸成絕技。但除了寫字之外，別無專長，父親一輩子注定要吃苦。所以到後來，他不但不能奉養老母，而且也無法維持妻兒的生活，弄

得非常難堪！

在我十歲前，父親在公家機關擔任文員，有固定的收入，加上祖母的積蓄及房產，日子過得滿好。但在我十歲後，家裡的情況愈來愈糟。最壞的是，父母都染上嗜賭的惡習。錢的需要與耗費大量增加。在入不敷出、長期透支的慘景下，家裡的東西能賣的都賣了，進當舖的次數也頻繁起來，甚至於連高利貸也要去碰，最後只有賣掉房子，搬進貧民窟。

那時，長我兩歲的哥哥，在小學畢業後，便去南京城外機場做車床工，找到一條生路。

後來，他先隨軍撤到福州，再由福州，遷到屏東。雖然他比我晚了一些時間到台灣，但總算一家有兩人逃離虎口，亦云幸哉！

哥哥去做工，平常不回來，家裡只有我和兩個弟弟。另外一個弟弟，生下來即送給城外一王姓農家做兒子。我變成家裡最大的小孩，無錢供我讀書，但也不能束手待斃，於是便和鄰家貧童一齊去打工。有時，我也帶著小我兩歲的弟弟同去。

當時，我幾乎什麼工都做，例如：摘豆芽、賣香菸糖果、拾煤炭、上山撿松針、下水摸磚頭、出殯掌旗等等。賺到的錢，便拿來買米、買菜帶回家。有時，也把賺來的錢交給父母保管，自己留一點零用。我記得利用這些辛苦賺來的錢買過日記本、自來水筆和雜誌。在增加知識和書寫方面所發生的潛移默化作用，到了台灣之後便顯現出來。有人認為這是祖上積德所致，但我深知這是來自早年喜讀愛寫的教養。

二、窮家子女求上進的大道

我到了台灣嘉義後，接到父親的信，也寄過一些錢回南京。但到了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淪陷後，便再無家中音信。思念的神經慢慢地麻木，也就順其自然了。

我在嘉義機場的工作，是負責修補機翼。機翼除骨架外，便是包布縫合和油漆。我做的工作是包布縫合，算是輕微的一種。直接管我的士官長和上面的機械長，都對我另眼看待，因為我姨父陸錦鑫先生也是機械長，在發動機部門工作。機械長與機械長之間，當然會互相照顧，所以我的日子好過多了。我的機械長李保之先生，是個老廣，有一子三女，讀書讀得很好。他看到我和他子女年齡相近，便鼓勵我業餘進修，並把他女兒用過的教科書拿來給我看。豈料我的悟性一被啓發，便不能自止。同時，機場同仁中也有程度較好的與好學的。有了互相切磋的伙伴，業餘進修更有效果。一年半內，我便以同等學歷考取台中師範學校。

一九五〇年夏天，兄弟二人一齊報考台中師範，弟弟考中，哥哥落榜。幸好，哥哥後來考取空軍機校，畢竟也上了一層樓，只是我們兄弟從此分道揚鑣，各奔前程，而一文一武的發展差異，隨著時間愈來愈大。這就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了。

那一年，中師招收八班普通班：五班男生，三班女生，每班五十人；另外，還招收以山地同胞爲主的簡易班。所以那一年的人數最多，學習的情緒也因此大大提高。那時的師範生享受完全的公費待遇：學費、書籍、食宿花費全免外，每人每年還有一套制服，另外每月還有少許的零用錢，真的比父母照顧得還要周到。這無疑是窮家子女求上進的陽關大道！

我被分在乙班，班導師李存祿先生，山東人，教我們自然地理。他從入學到我們畢業，當了我們三年的導師，對我們影響最大；尤其對我，更是鼓勵、愛護和重視。所以，他和我親密的師生關係維持了五十二年，一直到二〇〇二年一月十三日病逝密蘇里州Rolla鎮兒媳家爲止，享年九十三歲。這確實是人生不尋常的、正面發展的師生關係。一九六四年初，我從英國轉學美國之時，在美國駐倫敦大使館簽證所出示的兩千四百美元存款證明，便是李師囑託他在美的兒媳代我辦的。另外，我在中師三年級試教時，因違背校長規定，私自從附小返校取物而被班長記名。當時若無李師介入力護，恐怕畢業都成問題。

三、中師三年影響我一生

中師三年，是我人生的轉折點。

我入學年齡，較同輩長了兩歲，身心都較成熟，故而更加珍惜學習機會。一般而言，中師和一般高中相比，在文史方面，是不差它們的。但在英文、數、理、化方面就差多了。最特殊的，自然是教育概論、教育行政、教育心理、課程與教材、實習與輔導等一類的教育課程了。我感到吃力的課，是英文和數學。在這兩方面，我特別努力，慢慢地也跟得上班。

我對英文花的時間尤其多。每天早起，在操場跑完兩圈後，便是背誦英文，無日間斷。這種日積月累的、長期不斷的自我訓練，使我後來通過了師大入學考試、政大新研所考試、高等考試、自費留學試、中山獎學金留學試，以及美國的博士考試，真正地變成了「考試專家」。飲水思源，這都是拜中師三年重視英文之所賜。

中師三年的學生生活，現在回憶起來，最令我難以忍受的是飯吃不飽。正在發育階段的我，每頓只有一碗飯，而菜只限於幾塊蘿蔔，或一塊五花肉。校內既沒有地方可以加菜，而校方又不准學生帶菜進入飯廳，所以每晚只覺得飢腸轆轆，難以入眠。我在中師一年級時，忽然得了「夜盲症」，恐怕也與營養不良有關。後來，我服魚肝油丸才治好。

最令我感到榮幸的，是一年級時，我被教我們英文的訓導主任，選為學校代表之一（一共兩名），參加鳳山陸軍官校畢業典禮的盛會。那時，全省高中以上學校，每校兩名代表。觀禮後，全體學生代表和軍校畢業生大聚餐，聽蔣總統訓話。這種文武學生交流活動，令我感到新奇，眼界大開，難以忘懷！

還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，也發生在一年級。同年級他班學生私自組織「讀書會」，邀我參加，我因功課太忙而婉辭。豈知這個「讀書會」被校方注意。有一天，忽然一輛吉普車開進校園，下來兩個便衣，帶走了兩、三個同學，而其中一位一直未回學校。大家雖然不敢聲張，但心裡卻疑雲滿腹。那時，我能置身事外，也證明自己有明辨是非的眼光和能力。

三年的努力成果，帶來學業與操行「甲」等。這不僅增加我對人生的信心，也為「更上層樓」鋪了路。

四、在依依不捨中離開竹崎

台灣的成功，得力於它的基層教育系統。師範生畢業後，都有學校可教，達到了「學以致用」的建國目標，沒有浪費人力，物力與財力。這就是造成台灣社會安定、經濟繁榮、政治民主的根本因素。

一九五三年八月，我被派到嘉義竹崎國小教書。開學後，我擔任二年級甲班老師。講老實話，我在竹小這所平原與山地接壤、人事簡單、景色清幽的鄉村小學教書，心猶未甘，總想進入大學深造才是道理。爲了達到這個目的，我白天教書，晚上便在教室自修，積極備考。同時，開始儲蓄，籌劃大學費用。

在竹小教了一學期，康寬裕、陳淵源和我，都被派到台中車籠埔營地，接受四個月的預備士官訓練。那四個月的軍人生活苦極了！每天都在數饅頭，看看還剩下幾個（天）。就在

訓練期間，我被連指導員看中，要我加入國民黨，我答應了。後來，他又要我加入軍情系統，我婉辭了。

從車籠埔返竹小後不久，我便參加大學聯考，總分以三分之二之差而敗北。我在竹小又教了一年，擔任五年級甲班老師，學生比較大些，相處很好。但是，我爲了「更上層樓」，加倍努力自修，以免重蹈覆轍。結果，第二年再考時，考上師範學院（後改爲師範大學）國文系倒數第一。

五、在師大經驗一次拜師禮

那時，師院（大）是台灣唯一培養中學師資的學府，也是公費，生活條件比中師好。學生餐廳裡面有賣菜的小販，有錢便可買點小菜、點心，來補充餐廳飯菜之不足。甚至於也可以去學校附近餐館或飲食攤，吃一碗牛肉麵，所以不會吃不飽。

飯吃得飽，讀書也起勁。我在國文系四年，前兩、三年讀了很多專書，如四書、五經、唐詩、宋詞、元曲、文學史、讀書指導、國學概論、文字學、聲韻學，老子、莊子、楚辭、訓詁學、理則學、中國通史、近代史等，真的是用功一年，相當於讀兩年。到三、四年級，又想到學無止境，「更上層樓」。於是，我又加強學習英文，去英文系選課，準備考政大新研所，希望師大畢業後多一條出路。

我在師大四年，也有幾件值得回憶的事情。例如：我曾得到全校徵文比賽的首名，拿到

獎金後，請了幾位同學看了一場電影。在二年級上學期，獲得每班只有第一、二名才可得到的「國家自然科學文化獎學金」五百元（台大為一千元）。三年級，參加「平劇社」，演過「捉放曹」和「遊龍戲鳳」兩齣戲。

最特別的是，經驗過一次「古式」的拜師禮。我和陳新雄、阮廷卓兩位同班同學，被林尹老師看中，私下「拜」他為師，要點燭和磕頭的。他教我們研究古聲韻，從圈點「廣韻」開始。拜完師後，回到宿舍，越想越不對勁兒，怎麼做學問一定要走回頭路呢？這可能就是我不後來要去考政大新研所，而不考師大國文所的一種反抗心理作用吧！